

香港反清革命宣傳報刊及其與南洋的聯繫

吳倫霓霞

香港中文大學

辛亥革命領導者孫中山曾稱譽華僑為「革命之母」。有人認為這只是表示「無華僑即無革命」的意思，而且認為事實如此¹；也有人認為這是比喻的話。「孫中山是用這句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他的革命活動是從華僑裏面開始。」²不過，華僑曾經多次參與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活動，而且不限於開始的時期。今日可以見到的有關史料和研究所得都顯示自1895年孫中山首創興中會，以迄1911年的武昌起義，幾無一役不倚賴華僑的資助。此外，華僑無論在革命思想傳播方面，還是在起義行動方面，都有一定的貢獻。而治史者對這方面的研究亦很多。同時的香港同胞因為不在清廷轄治之下，處境一方面與海外僑胞有點相似，但在地理、社會、政治環境上又有自己獨特的地方，在辛亥革命期間，也曾作出重要的貢獻。不少有關辛亥革命運動的中外近著，對香港在革命運動所扮演的角色亦漸予重視³。但是以香港為重點的研究迄今仍不多見，僅有的也比較集中在香港與孫中山早年事蹟方面⁴。在整個革命期間，香港在宣傳、策劃、籌措金錢方面，都曾積極參與；而且，在地理及其他有利條件下，往往成為海外華

1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台北，1953年，頁1。

2 洪絲絲等《辛亥革命與華僑》，北京，1981年，頁1。

3 蔣永敬的《辛亥革命與香港》（見《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台北，1981年，中冊，頁506-526）是一篇初步的介紹文章。史扶鄰（H. Schiffrin）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中譯本，北京，1981年）及 Sun Yat-sen, *The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1980) 都特別注意到香港在孫中山革命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孫逸仙博士與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1983年）一書中亦有數篇會議論文提及香港與辛亥革命運動的關係。

4 前注所列各書的內容也是以孫中山早年時代為中心，至於專題論文則有陳錫祺的《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孫中山研究論叢》，第一冊，中山大學，1983年），吳倫霓霞的《孫中山早年革命運動與香港》（同前書，第三冊，1985年）及 Ng Lun Ngai-ha,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Shaping of Sun Yat-sen's Early Political Thought"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XIV, 1985)。

僑及國內革命活動的重要橋樑及交匯地。本文只就香港在反清宣傳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討。以下首先分析香港所具備的有利於發行反清革命宣傳報刊的條件，然後討論多種報紙。各報之中以《中國日報》最為突出，本文亦將以該報為討論重心。

一

香港位於廣州東南約一百三十公里，在珠江口東南，不但是華南地區的重要門戶，而且是中國沿海最優良的自然深水港，也是中國對外交通的主要中途站。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際，香港已具備良好的海港設施，航運佔世界第四位。當時來自日本以至歐洲或美洲東岸的越洋船隻都以香港為中途站，其中大部分亦經新加坡及南洋各地。太平洋兩岸的交通，無論經日本或澳洲，也多途經香港。以香港為起點的航綫則有直往印度、南洋諸島、海防、菲律賓及中國沿海各都市。香港與中國南部內河地區的小船運更為繁密，例如廣州與香港的輪船，每日二回的就有六家；至於每日一回或一週數回的，也為數不少⁵。至於陸路交通，自從1898年新界併入香港版圖後，藉著貫通新界的公路及九廣鐵路，香港可循陸路直達華南各地，與惠陽、東莞及廣州附近的交通，尤為方便。當時的香港，已經是國際貿易的轉口港，航運、電訊、郵務均可直接與世界各地重要港口或都市聯繫⁶。因此，訊息的傳遞，實在便利。

香港當時的社會結構，對於推動革命宣傳，也具備了有利的條件。香港雖然是英國人統治的地方，但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華人，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在建埠後從中國內地遷來的。他們不少只是為了謀生，並沒有作永久居留的打算；亦有把家庭留在國內，隻身來港工作的，因為交通方便，可以常常往返兩地。大部分香港居民對中國國內發生的事情都非常關心，對政治的認同亦與國內人民無異。大部分從內地跑到香港謀生的人都出身貧窮家庭，與中國士紳或統治階層少有聯繫，比較能夠接受革命的思想。香港的華人領袖出身亦有異於傳統的中國士紳人物。在香港早期，大部分的華人精英分子都曾接受英語及西方教育，他們不少曾留學歐美，然後回港任職醫生、律師、部分也有從商的。其中黃勝、何啟、韋寶珊等，社會地位很高，被香港政府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實際上就是華人領袖及代表⁷。這批華人精英分子對西方近代政體及政治思想都有認識，思想亦比較開放，他們雖然身居香港，對國事仍非常關心。中法戰爭後，何啟與胡禮垣先後在香港西文及華文報章上發表政論，指責

5 二十世紀初，來往香港及世界各大港口的遠洋船為數甚多，船期亦很密。各國輪船公司在香港設立總行或分行的超過六十間。香港不但是各地貨物輸往中國的轉運站，也是郵件的轉運中心。有關此時期香港與世界各地的航綫，可參閱日本外務省通商局編《香港事情》，東京，1917年，頁107-124。

6 有關香港、中國各地及世界各國城市的郵政及電訊交通可參閱上書，頁134-141。

7 在香港政府的制度下，最高的社會地位是被委任為行政或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廿世紀初，這些席位華人只得兩席。第一位被委任的是伍廷芳，（任期1880-1882），第二位是黃勝（1884-1890），接着下來的是何啟（1890-1914）和韋寶珊（1896-1914）。

清廷內政不修，引致外侮，並提出改革的主張⁸。

1860年代後期，香港轉口貿易的地位開始建立，社會上出現一批富商，其中不少從事運銷中國產品供應海外華人。他們把中國沿海貿易連接起來，開設所謂「金山莊」和「南洋莊」。他們也開辦銀號，從事匯兌業。自1870年代末，華人在香港的經濟勢力開始追上洋商⁹。同時有大量從北美、澳洲、南洋回來的華工，在港定居¹⁰。富有的還在香港投資，開設百貨公司、旅館、銀號、出入口莊¹¹。他們的貿易對象多是海外華僑；所以在外地，特別是南洋一帶，也開設分行。這些富商不一定都受過西方教育，但多與海外華僑有密切聯繫，不少還曾經留居外地，熟識當地情況。這些商人很多就在香港加入同盟會，在資助革命宣傳及聯絡海外華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¹²。

當時香港社會的新知識分子屬於所謂中層階級。他們多曾就讀西式學堂或英語學校，接受新式教育。離校後，大都任職教師、政府公務人員或洋行書記。他們都能接受新思想，又加以積極傳播。這些人物包括早期與孫中山先生在港倡議革命的「四大寇」及後來積極活動的楊衢雲、謝纘泰、周昭岳等¹³。

香港的特殊地位亦具備了有利於出版鼓吹革命的書報。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法例大都以英國為依歸。在英國，出版事業（特別是報紙）在十九世紀中葉後已建立了鞏固的社會及政治地位。自由黨與保守黨都利用報紙來宣揚政綱及抨擊敵對黨。歷史悠久、言論公正的報紙，例如倫敦的《泰晤士報》，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備受各方重視。在香港，出版及言論亦有頗大的自由。1844年的出版法例只規定出版刊物須向政府登記；而誹謗案的起訴，須首先向政府裁判官申請，所提證據獲得接受後，由總檢察作主控。1860年的修正法案把誹謗的起訴程序簡化，原告可直接提出證據控告出版者；法例亦首次規定報紙發行者須繳納保證金二百五十元。1886年，保證金增至一千二百元，新法例頒行的結果是報紙與政府的對立減

8 這些在香港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知識分子對清末的維新變革運動發表過不少評論，其中以何啟最為活躍，且曾協助革命分子在香港活動。關於何啟與胡禮垣的政論，已有不少專文論述，可參考J.F. Tsai, "Compradore Ideologists in Modern China: Ho Hai and Hu Li-yuan" (L.A., 1975)。

9 香港早期的大商行多數是英籍及其他非華籍商人所開設的，1870年代末華人開始收購不少外籍商行及地產。1881年在香港繳納地稅款項最高的十八名居民中，華人佔了十七名。參閱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975, pp. 175-176, 194-195)。

10 華人回港定居的數目在1890年代最高，帶回來的財富平均每年為一千萬元。他們大部分都留在香港發展，香港政府的稅收亦因此而大增，見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p. 252-253。

11 南北行出入口莊商人多為美洲或南洋歸僑，四大百貨公司（即永安、先施、大新及中華）的創辦人都是從澳洲回來的。1920年代香港的著名華人差不多有一半都是歸僑，參閱吳醒廉《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1940年。

12 關於香港南北行商人對革命的貢獻，可參閱譚永年《辛亥革命回憶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篇》，第二十六輯，文海出版社，上册，頁297-320。

13 上述幾位大部分在較早期都屬香港輔仁文社成員，有關他們的教育背景及早期活動，可參閱吳倫寬《孫中山早年革命運動與香港》，頁71-73。

少了，而保證金亦使若干資金不足的報紙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要不涉及誹謗，市民都可以自由發表言論。

香港建埠不久便成爲中國沿海報紙的重要出版地¹⁴。部分最早期的報紙如《中國之友》(1842)、《東方地球》(1843)、《香港紀錄》(1844)都是傳教士所辦的，但股東則大部分是商人。至於較後及更爲重要的報紙，如《德臣西報》*China Mail* (1845)、《孖刺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1857)及《士蔑新聞》*Hong Kong Telegraph* (1881)，都是由香港洋商主辦的，各代表勢力很大的商行或商人集團¹⁵。報紙主要報導船舶及商業活動，但亦積極發表文章，推動政府施行對商人有利的政策。它們常對政府提出嚴厲批評，甚至猛烈指責政府，政府亦只能引用誹謗法例的民事訴訟起訴報館，而且不一定能獲勝訴。因此當時在香港辦報在法例方面所受的限制實在不大。

中國近代報業開始於香港。第一張華文日報《中外新報》創刊於1860年，是附屬於《孖刺西報》的中文譯版。一般相信早期由黃勝及伍廷芳負責。1864年《德臣西報》亦創辦中文《華字日報》，以陳靄亭爲主筆。中國人自資創辦的報紙則始於由黃勝資助、王韜爲主筆的《循環日報》(1873)。《華字》與《循環》兩報是中國現代報業的先驅，多運往內地廣州一帶銷售。銷路不限於香港，甚至遠至其他沿海商港。報紙的言論以提倡變法革新爲主，對推進當時的洋務及維新運動，有一定的貢獻¹⁶。

1882至1892年間，孫中山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學校就讀，對上述有利發刊報紙作宣傳的情況，當有認識。自1895年廣州之役失敗，孫先生經數年在海外爭取華僑對革命的支持，深感宣傳的重要，便於1899年派陳少白到香港辦報，其目的是「鼓吹革命」，其原因是因爲「香港爲華南門戶，接近南洋一帶，交通便利，言論自由，報紙可號召中外。……」¹⁷

孫中山在他的論說中，雖一再強調宣傳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對利用報紙作宣傳，他也不過是步康、梁的保皇派後塵而已。在興中會初期，革命派的宣傳工作僅限於把《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重印，以喚起漢人對滿清殘酷行爲的記憶。至於以鼓吹君主立憲、響應康、梁派爲主張的報紙，則早在1880年已在香港出版。這便是由陸驥所創辦的《維新報》。陸氏是香港的資深報紙編輯，曾任外資所辦《近事彙編錄》的主筆。1895年康有爲上書清廷

14 有關沿海報紙的發展及其內容的簡介，可參閱 Frank King, ed.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 Coast Newspaper* (Harvard East Asia Monograph, 1965)。

15 有關各報的不同政見及他們與香港政府的關係，可參閱 Ng Lun Ngai-ha, "A Survey of Source Materials in Hong Kong Relating to Late Ch'ing China"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h'ing Archives Symposium*, Taipei, 1982, pp. 209-216)。

16 有關此兩報內容的介紹，可參閱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台北，1977，頁10-15、80-95。

17 湯承業《國父革命宣傳志略》，台北，1966年，上册，頁447。

變法，維新派分子隨即在中國各地組織學會及發行報紙，鼓吹維新思想¹⁸。各地報紙中以在上海的《時務報》最具規模¹⁹。1897年創辦於澳門的《知新報》與香港的《維新報》遙相呼應，鼓吹變法思想，所發表的議論有時比《時務報》更為敢言²⁰。戊戌政變後，國內支持維新的報紙不少被迫停辦，康、梁等便積極在海外建立宣傳陣地。1900年左右辦的報紙包括橫濱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神戶的《西東報》、新嘉坡的《新中國報》、舊金山的《文興報》、紐約的《維新報》等。革命黨在海外的宣傳工作方面比起當時主張「尊皇」變法的維新派明顯處於下風。這也許是因為革命黨人在初期只注意實際工作而忽略宣傳的緣故。革命黨在第一次舉事失敗後受到清廷的密切注意，更加不敢公開宣傳。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最初的革命派核心人物大都是新知識青年，在文字的修養上無法與康、梁一派的士大夫出身的人物比較，在文學宣傳上稍為落後。

陳少白是早期革命核心分子「四大寇」中最長於國學的。因為他曾「居鄉習舉子業，聰穎能文。」他也曾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熟識香港環境，與香港知識分子及各階層素有交往²¹。到港後，他首先得到何啟及區鳳墀的幫助，查探香港政府對革命黨人的態度。何啟當時是香港的華人領袖、香港立法局議員，地位崇高；他又是陳少白和孫中山在香港西醫學院的老師，與二人關係密切。區鳳墀則是孫中山的漢文老師，當時在香港華民政務司署任華人總書記，亦有相當地位。他們知道孫中山在1896年給香港政府驅逐出境，五年內不准入境的禁令仍然有效，而陳少白則沒有牽涉入事件之內，所以可以向政府按例註冊出版報紙。他們出版的報紙定名為《中國日報》，登記日期為1899年12月11日，報社設在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²²。

孫中山、陳少白、馮自由以及一些研究中國報業的學者都認為《中國日報》是革命派公言革命的第一張報紙。可惜現存香港、台灣、海外的《中國日報》都已殘缺不全。幸好根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於1969年所編的《中國日報》四冊，再加上其他早期的有關著作，還可以略窺該報在宣傳方面的梗概²³。《中國日報》創刊初期每日出紙兩張，在內容上還未能發揮最大的宣傳作用，因為經1895-96事件後，革命黨人仍不明瞭英國人的對華政策，未敢高倡革命排滿之說。再加上早期助理筆政者如揚少歐、洪考允、陸伯周等都是舊學出身，對歐美新思想一知半解。他們的革命意識，多基於「讀易至湯武知革義，讀孟子知民貴君輕」²⁴。

18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北京，1984年，第三章。

19 同上注，頁168-189。

20 同上注，頁209。

21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70-71。

22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Jan. 10, 1900.

23 1969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把殘存的《中國日報》影印出版，列為《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第二集，分裝為四冊；但四冊只包括1904年、1907年及1908年1月的報紙，且其中亦有缺漏。本文介紹的《中國日報》都引自該影印本，以下引述只將報紙日期寫出，不另注出處。

24 元冰華《清末革命與君黨憲的論爭》，頁106。

《中國日報》在編排上與當時的《循環日報》頗為相似，這可能是因為洪孝允曾任《循環日報》主編的緣故。《中國日報》每日有「論說」一篇，排列最前，可惜最早期的《中國日報》目前尚未能找到，不知道「論說」篇中的政治言論如何。1901年該報已增至六頁。第一頁全頁廣告，原來的「論說」及時評改排在第二、三頁。第四頁是遊戲文章，以諷刺時政、啟迪民智為主。第五頁設「專件」一欄，詳細報導有關國內時事的原來文件，如奏摺、通告等，其餘則為廣告。第六頁是本港時事及從外地拍來的電報新聞。就宣傳革命這點來說，自然以每日的「論說」最為重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刊登在第四頁的遊戲文章。這些文章體制與較早時在《中國旬報》上登載的頗為相似。專頁名《鼓吹錄》，每天的文章欄目並不相同。就現存1904、1907及1908三年出版的《中國日報》來看，文章包括諧文、雜俎、談叢、傳奇、笑林、白話、粵謳、新戲、龍舟歌、南音、班本、雜曲等不同體裁。文章都以淺易文字或廣東俚語寫出。這顯然是為了遷就一般讀者，目的是使報紙更易於接近教育程度不高的群眾。這是該報最創新的地方。文字的宣傳對象，除了教育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外，還包括社會的各階層，這也是該報成功的地方。

1901年，鄭貫一加入《中國日報》為記者。鄭氏本是橫濱《清議報》的副主筆，因發行《開智錄》半月刊而開罪康、梁。稍後加入《中國日報》的有廖平庵、盧信公、陳詩頌、黃世仲等。鄭貫一從日本歸來，向讀者介紹歐美的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類學說，立論新穎，使《中國日報》的內容大為充實。但在攻擊清政府、鼓吹民族主義方面，該報仍多采用旁敲側擊的方式，以古喻今，以外比中。例如《波蘭志士之反動》（1904年3月5日）一文，以波蘭比喻中國；《專制之衰運》（1904年3月22日）指出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受挫是因為國家實行專制；《清官之近狀與中國政府之前途》（1904年5月14日）則指斥官場腐敗。比較具煽動性的文章，多在第四頁登載，內容以遊戲文章方式表達，對滿清官吏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下列是其中一例子。《賊唔怕做》（1904年4月11日）：

賊唔怕做，總要做得時興。你睇咁多賊仔又去投誠。我地不過放火殺人，兩樣本領，點敢共道員千總，動吓刀兵，……唉，我地不過交迫飢寒，唔顧得住性命，故此疊埋心水，掛個盜賊虛名，虧你清官日日言新政，做乜貧民唔養，重要慘殺零丁。……況且做賊可以做官，又係多一條捷徑。

此外一篇《保國歌》（1904年6月11日）亦很具煽動性。歌詞頗長，共有一百四十多句，茲錄數句如下：

不平不平大不平，賊種乳臭皆公卿。
食我之毛踐我土，忘恩負義太無情。
八旗駐防防家賊，貪官個個良心黑。
……，……。
民族主義大復仇，二百年後先回頭。
還我江山如舊主，不逐胡人誓不休。

《中國日報》除抨擊清廷外，尚與保皇派報紙展開論戰，因為立憲之說「多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²⁵第一次筆戰發生於1902年，當時洪全福、李紀堂等計劃在廣州起義，結果失敗。廣州《嶺海報》排擊革命黨，指為大逆不道。《中國日報》加以反駁，雙方筆戰逾月。據馮自由所述，「粵垣志士，紛紛投稿為《中國日報》聲援，而革命書報在粵銷場大增。」²⁶1904年，康有為吩咐學生徐勤在香港發刊《商報》，大倡保皇主義。《中國日報》又撰文反駁，其中由陳少白執筆的續稿達十數回。可惜現在都殘缺不全，僅見的只有數篇。其中《與康有為書》（1904年3月7日）一文指康氏之說前後矛盾，只是頌揚滿州政府；《清國近代之大言家》（1904年3月24日）一文則斥責康有為自視太高，「志在官場，以私言強論公理。」至於以遊戲文章諷刺康、梁的就更多，而且在內容及詞句方面深具挑釁性。值得指出的是文章內都用「南海糠」、「新會梁」來代替二人的名字²⁷。

1905年，馮自由從日本來到香港改組同盟會，兼任《中國日報》社長。馮在報上發表長篇論文《民生主義為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長二萬餘言，被喻為「我國言論界暢論民生主義之嚆矢」²⁸。那時的南方革命漸成風氣，報紙銷路日廣，該報言論亦漸趨激烈。1906年，《中國日報》經售的民報特刊《天討》，刊登畫著清帝破頭的漫畫一幅。香港政府認為該幅漫畫有煽動性及侮辱性，把這期的《天討》沒收。立法局隨即通過法例禁止華文報章刊載煽動作亂文章²⁹。法例通過後，《中國日報》的遊戲文章便寫得較為含蓄。但在「論說」一欄的言論卻比以前激烈，甚至公言排滿及革命。例如《亡國奴之真相》（1907年7月13日）一文便直言清室將亡；《拓降滿洲將士布告》（1907年10月1日）一文則公開勸滿洲將士歸附革命行列。1907年9月28日登載的《中華革命四言告示》，把清政府的腐敗、百姓的痛苦，用四字句寫出。下面是其中的四行：

革命軍起，驅逐滿清。茲將大義，布告人民。自彼滿洲，奪我中國。生民無依，慘受暴虐。
租稅抽剝，刑罰苛繁。貪官污吏，富如豺狼。內則肆虐，外則召侮。割地棄民，旦夕不保。

後文繼續號召人民起義，「驅彼韃虜，還我河山。」由於文字易懂，讀來順口，相信是一篇很成功的宣傳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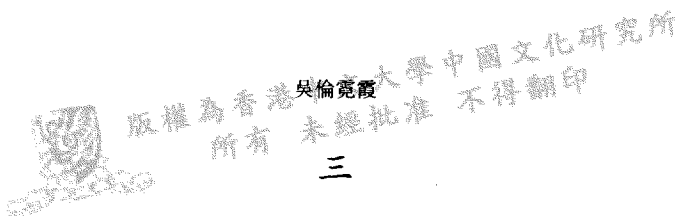
25 同上注，頁24。

26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68。

27 例如1904年4月14日的「保皇歌」一欄就指康有為以保皇名義中飽私囊，販賣「糠毒」。1908年1月3日的「趣評」更將保皇黨比喻為妓女。

28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70。

29 該法例在1907年3月10日立法局會議上提出討論。當時提出此法案的香港輔政司，指出革命報紙公言反清會影響英國與清廷的關係。會議上即有人指出人民可引用1866年法例發表政見，但不能侮辱官員。結果新法例仍獲通過。見 *Hong Kong Hansard*, 1907, pp. 55-56。



《中國日報》在香港創刊，成為革命宣傳報刊的鼻祖，而且一直充當革命黨的喉舌。民國成立後，《中國日報》遷往廣州，於1913年被龍濟光下令停刊。該報在香港出版十一年，在招攬人才、籌措經費及與海外華僑聯絡等方面，都得到香港人的大力幫助。首先，先後任社長及主筆的陳少白、馮自由和謝英伯的家庭成員或教育出身都與香港及海外有密切關係。陳少白曾就讀香港西醫書院，這點上文已經提及。馮自由祖居香港，其父馮鏡如亦在香港出生，後來僑居日本。但馮自由幼年便回國讀書，後就讀東京專門學校，與香港富商李煜堂的兒子李自重、女兒李自立一起加入興中會。馮自由後來更與李自立結成夫婦。馮自由與香港關係密切，這點令他在香港的活動得到不少當地人的支持³⁰。1910年繼馮自由任社長的謝英伯則出身暹羅歸僑的家庭，在鄉中受過私塾教育後，便到香港皇仁書院接受英國教育。謝英伯在讀書期間已開始投稿《中國日報》。畢業後，先後任職廣州《亞洲日報》及香港《東方日報》、《時事畫報》³¹。

《中國日報》創刊初期，大部分的助理主筆及記者都曾在香港的華人報紙任職，其中以陸伯周及洪孝允的資歷最老。陸氏在附屬於《孖刺西報》的《中外新報》工作多年，並由1880年開始任該報的編輯。洪孝允則曾任王韜的助手，王氏於1884年離港赴滬後，洪孝允便繼任《循環日報》主編。至於負責翻譯的郭鴻達和馮扶，也是香港學校出身的。

《中國日報》在香港除了招攬到不少人才外，在經濟上又能得到香港人的支持。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李紀堂³²。他是香港富商李陞的兒子，身兼銀號東主及日本郵船公司買辦。1900年李紀堂由謝纘泰、楊衢雲介紹加入興中會。《中國日報》創刊時，資金是由孫中山撥付的，但不到一年，孫中山已無資助宣傳機關的財力。《中國日報》面臨倒閉，幸而得到李紀堂的撥資相助才能繼續出版下去。據馮自由所述，「自庚子以至丙午之七年間，維持中國日報之經費，大都取自紀堂一人。」³³1904年，李紀堂以《中國日報》出版費用龐大，為免無限的債務風險，便把報社與香港的著名印刷公司文裕堂合併，擴大組織，定名為「文裕堂有限公司」。同時容閱的姪兒容星裕木加入為股東。1906年，《中國日報》受訟事牽累，（被保皇黨根據香港1880年誹謗法例起訴）加上裕文堂因營業不振而宣報破產，《中國日報》再次面臨倒閉。當時李紀堂因為長期出錢維持《中國日報》及多次資助起義行動，已無力挽救殘局。幸而馮自由得李煜堂和吳啟東集資向文裕堂購買該報，《中國日報》才能續辦下去。此後《日報》的財產便由李煜堂不斷補充。自從李煜堂與吳啟東加入後，《中國日報》的發展又展開了新的一面。因為煜堂是

30 有關馮自由生平及其在香港活動，可參閱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誌》，台北，第六集，頁162-186。

31 同上注，第十九集，頁300-302。

32 關於李紀堂對革命活動的貢獻，可參閱前書，第一集，頁439-448。

33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162。

美洲歸僑，在香港開設藥材行、金山莊數間，分行遍設國內商埠及南洋各地³⁴。吳啟東亦是美洲歸僑，專營美洲及南洋出入口生意³⁵。李、吳二氏都是香港商界的領袖，他們的背景與香港世家出身的何啟、黃勝、李紀堂等又有不同。他們都是四邑人，早年在外地營商致富。在香港開展業務後，又繼續與海外華人保持密切的關係。由於他們在生意上信譽昭著，所以在僑商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與號召力，有利於他們聯絡愛國僑商的工作。

關於南洋華僑在經濟上支持《中國日報》，尚未有比較直接的資料。不過根據馮自由所述，「丙午年秋，香港《中國日報》改組，西貢同盟會李亦愚、潘子來、顏大恨等合認新股三千餘元，《中國日報》大得其助。」³⁶《柬埔寨華僑誌》亦有如下記載：「柬埔寨華僑當時消息靈通，力量團結，並籌有公款，分別撥《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藉以宣傳革命。」³⁷

1909年廣州新軍起事失敗，革命黨人之氣大傷，《中國日報》又面臨困境。結果由香港南方支部撥款支持，才能續辦下去。該部有中堅人物三十名，其中四邑人佔四分之三以上³⁸。他們的出身和經歷，與李煜堂及吳啟東亦頗相似：同樣出身歸僑之家，也同樣曾在外經商。他們回國後在港營商，生意多與華僑有關，或接駁僑匯、或採購參茸、藥材、布疋等，供應海外華人所需；他們亦由南洋一帶買入大米、木材、香料等貨物運到香港及中國內地發售。這些商人教育程度雖然一般都比不上香港早期的精英世家，但在僑鄉或海外欲曾目睹民族的苦難，所以他們都有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他們在香港商界的地位也很高，信譽昭著，特別得到海外華人的信任。其中李煜堂、伍耀廷、伍于簪、譚煥堂、譚肇康、李文啟都先後任香港東華三院或保良局總理，晉身為香港華人的領袖³⁹。

四

《中國日報》是香港維持最久、銷路最廣、影響力最大的革命報紙。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文中說：

《中國報》者，唯一創始公言革命報，亦革命過程中一繼往開來的總樞紐也。自己未廣州事敗，同志星散，團體幾解，《中國報》出，一以懸一斷未斷之革命工作，喚醒多少國民昏醒未醒之繼夢，鼓吹「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主義，戰敗康氏保皇之妖說，號召中外，蔚為大革命之風。不數年，國內商埠，海外華僑，聞風興起，同主義之報林立。⁴⁰

34 譚永年《辛亥革命回憶錄》，頁297-300。

35 同上注，頁341-343。

36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50。

37 《柬埔寨華僑誌》，台北，1959年，頁46。

38 譚永年《辛亥革命回憶錄》，上册，頁358-362。

39 同上注，頁367-442。

40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台北，頁62。

《中國日報》創刊初期，言論尚未趨於激烈，所以能公開行銷至中國內地。據馮自由說，1901年該報在廣東最暢銷，僅粵督督署一處，銷售量已達二百份。粵督陶模父子亦喜歡閱讀該報，而且「其黜陟屬吏，恒以《中國日報》之評判為標準。」⁴¹此外，從其他資料亦可見當時該報以佛山為重要代理，行銷東莞、南海等縣。1902年加入該報為記者的廖平子、王軍演、黃晦開、盧信等都是廣東人，而且都曾在原居縣地閱讀該報，進而投稿，抨擊清暴政，鼓吹民族主義，《日報》社長陳少白慕名而延任為助理筆政。此後《日報》亦增加了用白話甚至廣東俚語的遊戲文章，包括木魚、龍舟歌、燈謎、雜俎等，這相信是以廣東地區的一般人民為對象的。

《日報》文章採用淺易的白話文也可能是為了適合僑居海外的華人。特別是南洋的華人，他們大都屬廣東或福建籍。早期僑民大都是勞苦階層出身，很少機會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康、梁的保皇派在1890年代已在該地展開宣傳工作，辦有《天南日報》及《南洋總匯報》。1902年，陳少白經尤列在南洋所設立的中和堂的幫助，羅致了原任《天南日報》的記者黃世仲、康蔭田來港任《中國日報》記者。當時《日報》以中和堂為代理，在南洋的銷路大為增加。從1904年該報所列的代理處可知其經銷地，計國內有佛山、江門、海口、北海、廣州灣、梧州、汕頭、廈門、福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膠州、漢口等地；在海外則包括小呂宋、臺灣、星加坡、泗水、檳榔嶼、南非訥他、橫濱、神戶、東京、金山、溫歌華、烏約（紐約）、新金山、檀香山。報紙訂閱價每年六圓，每月六毫，外埠郵費長年五圓，省、佛、澳無需郵費。報價非常低廉，其主要目的是使報紙能在普羅大眾中廣泛流傳。

1906年，粵督岑春煊下令禁止《中國日報》入境，報紙在粵的銷路大受打擊。但是，因為香港與廣州、澳門及附近地區的交通非常方便，可經許多不同途徑把報紙輸入內地。從一些革命黨人的記述可以知道革命報紙在國內秘密流傳，影響甚鉅。其中尤以東京的《民報》及香港的《中國日報》最受注意。刊物中則以《天討》、《黃帝魂》及《革命軍》最為流行。《革命人物誌》所載有關黃俠毅、莫紀彭、李文甫、林直勉等的初期的革命活動，有如下的記述：「四人愛讀禁書禁報，受其激列殊深，於石龍莞城兩地，常借託社會事件，登壇演說，為喚醒民衆之意志，以勸戒鴉片為題，指斥時政之腐敗，間接灌注排滿之思想。」⁴²

《中國日報》是革命黨人宣傳革命的第一張報紙。其後在各地出版的革命報不少都是由該報的前任報人主辦或編輯的。在香港，緊接《中國日報》出版的革命報紙差不多都是由曾在《中國日報》工作的記者主辦的。1903年鄭貫一離開《中國日報》後，先後創辦了《世界公益報》（1903年-1919年7月）、《廣東日報》（1904年-1906年）及《有所謂報》（1905年-1906年）。鄭貫一之後的王軍演、盧少岐、黃魯迅等都出身《中國日報》。鄭貫一於1906年逝世，繼續出版的《東方日報》（1906年）及《少年報》（1906年-1907年），則由《有所謂報》的編輯集資開辦。這些報紙，除了《世界公益報》得到基督徒林護、馬治泉、譚民三以及海外華僑的資助外，

41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67-68。

42 《革命人物誌》第七集，頁49。

都由於資金不繼，出版不及一年便停刊。據馮自由說，《有所謂報》以趣味小品文章為主題，內容莊諧並重，銷路為當時穗、港兩地報紙之冠。可惜這些報紙在香港無法得見，未能作進一步的研究⁴³。

革命報在南洋的創辦也與《中國日報》有直接關係。南洋一帶的宣傳工作保皇黨已捷足先登，星加坡的《天南日報》便是保皇黨的宣傳報刊。寓居香港多年的尤列在惠州之役失敗後，逃往海外。1901年抵達南洋，在幾個主要城市成立「中和堂」，並說服早期支持康、梁的華僑領袖陳楚楠和張永福投資五萬元創辦南洋第一家宣傳反滿的報紙——《圖南日報》。該報於1904年出版，總編輯陳詩仲、副編黃伯耀及康蔭田都是從《中國日報》羅致回來的。《圖南日報》是南洋華僑革命黨所發行的第一份宣傳報刊，雖因銷路不廣，虧折過鉅而被迫於1905年停刊。但繼之而起的革命報紙很多，在星加坡有《總匯報》（1905年）、《中興報》（1907年）、《星洲晨報》（1907年）及《南僑日報》（1910年）；在檳榔嶼有《檳城日報》（1907年）；緬甸有《光華日報》（1910年）；吉隆坡有《吉隆坡日報》（1909年）；暹羅有《美南日報》（1906年）⁴⁴。這些報紙以《中興報》所維持的時間最久，其他的則因經費短缺而被迫在一兩年內停刊，與香港大部分的革命報紙情況差不多。這些報紙雖然出版日期不長，但在鼓吹革命及與保皇派報紙筆戰這兩方面的確作出不少貢獻，也加強了南洋、香港和中國內地革命黨之間的聯繫。報社相濡以沫，往往互為代理，互相登載發刊消息。以《中國日報》為例，該報差不多每日都登載外銷革命報紙的廣告，注明某報某期已運到港，並介紹該期的特別文章。《中國日報》在外地的銷路也依賴海外報紙的宣傳。從1908年《中國日報》舉辦徵聯活動一事已可見該報與海外革命報紙頗有聯繫。當時的聯繫是通過海外的報紙，如新加坡的《中興報》、檳榔嶼的《檳城報》、仰光的《光華報》等代為募集的。海外（特別是南洋各地）應徵者十分踴躍，超過數千人。得獎的頭十名海外就佔了三名⁴⁵。

革命報紙在香港、南洋兩地此蹶彼起，報人在不同的報館工作相信一定為數不少。就以康蔭田為例，他本來任《天南日報》記者，1902年加入《中國日報》，其後迭任新加坡《圖南日報》及香港《少年報》、暹羅《華暹新報》記者；黃伯耀也是先任職《天南新報》，然後加入《中國日報》，1904年任《圖南報》副編輯，翌年又回港任《世界公益報》記者。而《圖南報》、《中興日報》創刊時的編輯陳詩仲、張邦翰及王斧，都曾任香港的《中國日報》及《少年報》記者⁴⁶。

43 有關香港革命報紙的出版日期、負責人物及內容的簡單介紹，可參閱馮愛群編《華僑報業史》，台北，1967年，頁11-19。

44 關於南洋革命報章的出版及內容，可參閱華僑革命史編輯委員會《華僑革命史》，台北，1981年，下冊，頁144-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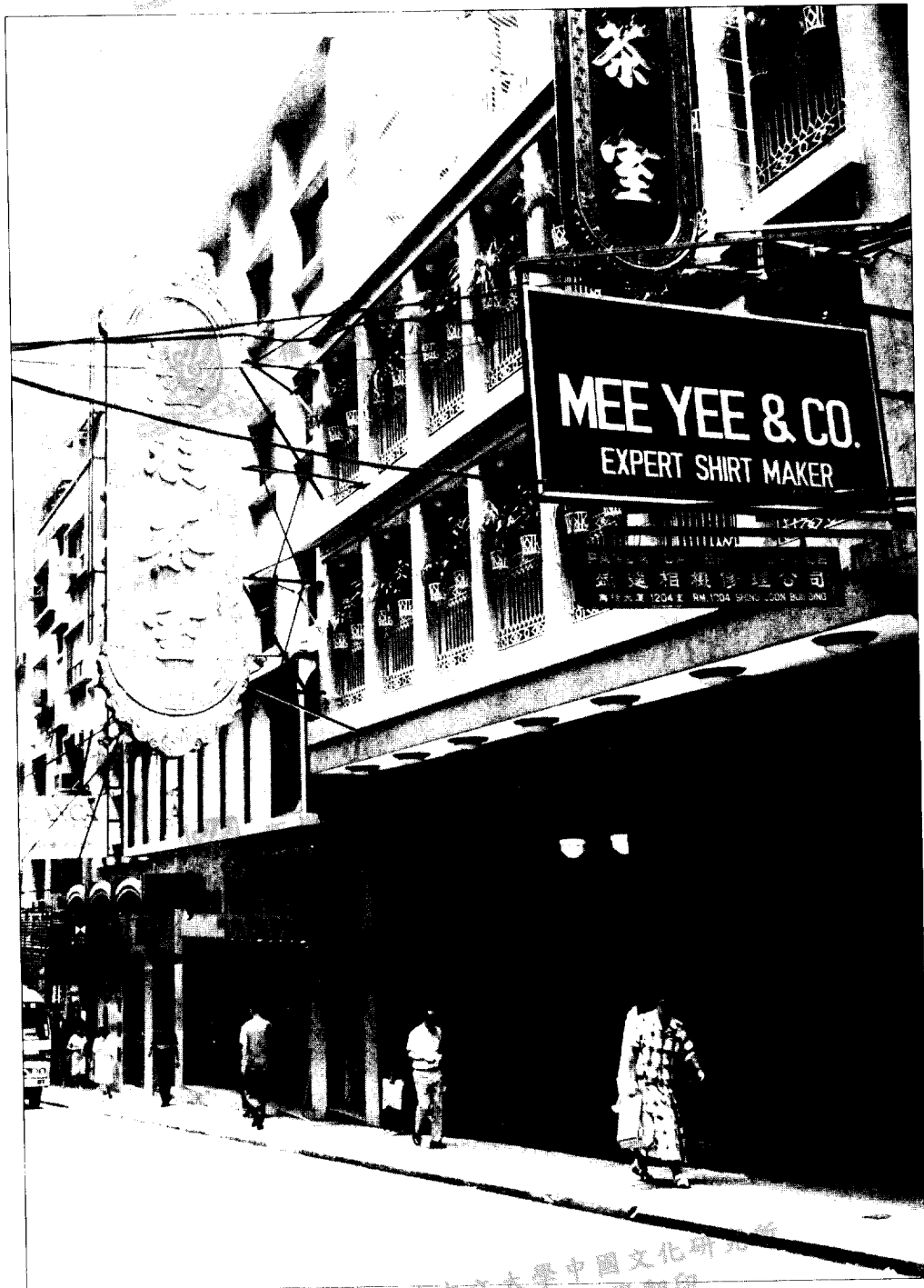
45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273-274。

46 關於革命黨報人的工作及簡史，可參閱《革命之組織及發展》，《中華民國開國五十週年文獻》，「革命志士」欄，台北，頁334-338、350-354、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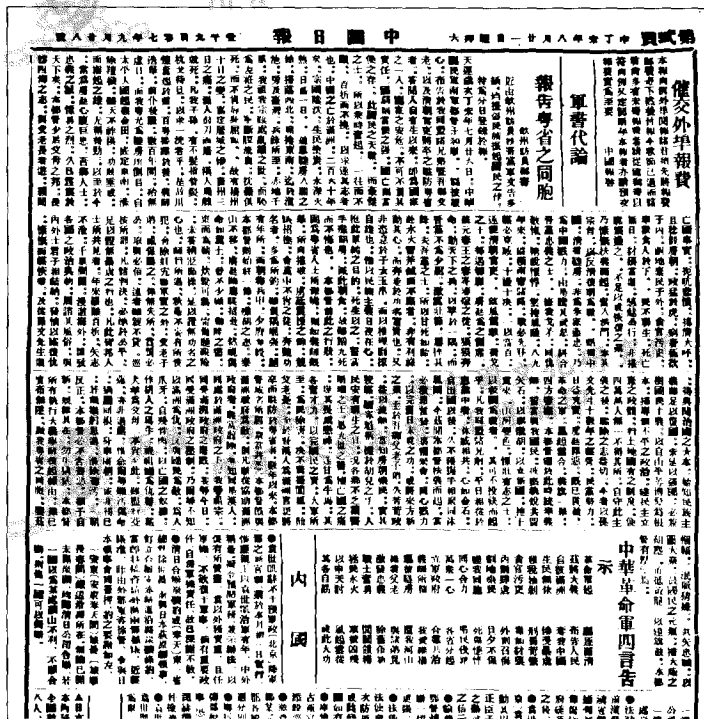
在革命宣傳活動方面，香港報紙中以《中國日報》和《中興日報》與南洋華僑的聯繫最密。首先，《中興日報》的創辦與較早前《中國日報》在港設立時的情況有點相似，兩者都是由孫中山先生親手策劃的。當時的《圖南日報》及繼之而起的《總匯報》，都是由華僑集資開辦的。但後者創辦不久，股份便被支持康、梁的商人控制，變成保皇黨的宣傳報紙。1906年，當時在星加坡的中山先生與胡漢民有見及此，便籌集資金創辦《中興日報》。支持者除了大部分是當地華僑外，在香港的吳東啓、鄧仲澤、胡鼎男也參與籌集。《中興日報》於1907年創刊，集中了當時革命黨的一些精英如胡漢民、田桐、居正等為主持，並羅致《中國日報》、《少年報》的張邦翰和王斧為編輯⁴⁷，明顯地提出反對滿清專制，並與《總匯報》展開筆戰，成為在南洋的革命黨言論機構的領導者，地位一如在香港的《中國日報》。《中國日報》與南洋各革命報紙的聯繫及其工作意義，可從革命志士譚永年的記述反映出來：「兩方報館之執事人等，不止交換情報，轉載作品，而且對於一切宣傳策略，攻擊目標都是以一致的行動，齊一的步驟，面對着專制政權與黑黨攻勢之下，發揮各個高度之宣傳戰略，達成其使命。」⁴⁸

47 《華僑革命史》，下冊，頁145。

48 譚永年《辛亥革命回憶錄》，頁154。




圖一 《中國日報》報館原址 —— 士丹利街 24 號今貌



圖四 《中國日報》刊登的《中華革命軍四言告示》是比較激烈的反清文章。



圖五 《中國日報》上的一篇諷刺保皇黨的文章將該黨比喻為妓女。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Anti-Manchu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A Summary)

Ng Lun Ngai-ha

This is a study on Hong Kong as a base of anti-Manchu propaganda wher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were published.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Chung Kuo Jih Pao* 中國日報, which wa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papers.

With its easy access to Kuang Chou and communication links with cities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Japan and other places, Hong Kong was conveniently located for the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paganda books and newspapers. Moreover, Hong Kong had since its early years been an important centre for the printing and publica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for circulations in China as well as abroad. There was no constraint on the press except libel laws. Between 1900 and 1911, Hong Kong became the centre where no less than eight different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ut most of these were able only to last for two to four year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finances. The *Chung Kuo Jih Pao*, established in 1900 by direct order of Sun Yat-sen, was able, however, to last until 1913. During these years, it was largely through the support and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of a number of patriotic Chinese merchants, some at the expense of getting into bankruptcy, that the newspaper was able to weather the storms and remain a powerful mouthpiece of the revolution.

The tone of the newspaper was quite mild in the first few years of its existence. It became more radical in tone from about 1904 onwards, attacking the corruption of Ch'ing officials and calling for the people to jo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ne special feature was a column containing satires written in colloquial Cantonese in the form of riddles, songs, comedies, etc. ridiculing the Ch'ing government and the monarchists.

With its circulation extending to China and abroad, The *Chung Kuo Jih Pao*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paganda battle against the Manchu as well as the monarchists. It further provided much of the manpower, including editors and reporters, for other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Its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preading of anti-Manchu ideas amongst the overseas Chinese.